

1/1992

- 回忆“穷棒子社”
- 走出黑幕
- 一切为了抗日
- “磨擦专家”张荫梧
- 《河北文史资料》选辑总目录

河北文史资料



《河北文史资料》编辑部编辑

(石家庄市维明街34号河北省政协 电话:23134 邮政编码:050051)

季刊 大32开 石家庄市红旗印刷厂印刷

河北文史书店发行(石家庄市维明街34号 电话:26971—269)

国内统一刊号:GN13—1042

定价:2.50元

又是一年芳草绿，依然十里杏花红。

新春伊始，本刊又长了一岁。如今，我们不仅拥有许多老读者、老朋友，又结识了众多新读者、新朋友。请接受编辑部全体同仁对新老朋友春天的问候与祝福！

本期《共和国足迹》栏目中，发表了王国藩同志《回忆“穷棒子社”》的史料。该文向我们展示了合作化时期一幅真实、生动的历史画卷，揭示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。篇幅虽然长了一点，但读来朴实、生动。当年“穷棒子”们艰苦创业、一心奔社会主义的执着精神，仍然是当前坚持改革开放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必须发扬的宝贵精神财富。另一篇《对50年代河北省消灭性病的回忆》的文章，则实实在在地告诉人们，历代封建王朝和国民党政府所不能办到的事情，共产党办到了。这对于我们今天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仍有借鉴作用。《回首往事》栏目中发表的原国民党“军统”少将徐宗尧的回忆录和现居台湾的李文岚先生关于《我在芦沟桥事变中的经历》等文章，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视角，叙述了当时的史实，值得一读。

为了增加本刊的容量,使之内容更丰富多彩,从本期起开辟了《文摘》栏目,选编海内外特别是台、港、澳的史料,以飨读者。应读者要求,本期刊登了《河北文史资料》1—20辑目录,下期将登载21—40辑目录,以成完璧。

办好刊物离不开读者的支持与帮助。读者诸君对本刊有何意见、建议，诚望提出，以便帮助我们改进工作，把刊物办得更好。我们期待着。

编

者

祭

语



河北文史资料

EA36/27

目录

●共和国足迹

回忆“穷棒子社”

王国藩 1

对50年代河北消灭性病的回忆

张剑侗 45

●回首往事

走出黑幕

——一个军统少将的回忆

徐宗尧 53

我在芦沟桥事变中的经历

李文岚 71

忆涉县“动委会”

孙锡琪 82

冀南参观团见闻纪实

徐凯天 89

●史海存真

一切为了抗日

——记抗战时期河间县的民族统一战线

秦根祥 103

冀察绥靖公署琐忆

韩立才 118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办

总编：李秉新 副总编：徐俊元 石玉新

朝鲜义勇军在涉县 宽城“无人区”	史安昌 张明元 125 杜清怀 133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●人物春秋

“磨擦专家”张荫梧	杨悦海 141
魏益三事略	陈志新 158
韩复榘审案实录	乔新尘 170

●文摘

中国国歌史	秦启明 173
是谁亲自策划了“芦沟桥事变”和南京大屠杀	华永正 177

●资料

《河北文史资料》选辑总目录（1—20辑）	183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●补白	南京“中村事件”真相（132页）直隶陆军小学 简介（157页）孙中山轶事三则（200页）
-----	---

责任编辑：杨小波 谢凤英 武永召
封面设计：宋丕胜

回忆“穷棒子社”

● 王国藩

我们遵化县西铺村创办“穷棒子社”，距今整整40年了。

50年代初，在磅礴全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，我村23户贫农带头响应党的号召，办起初级社，即“穷棒子社”。由于坚持积极领导，稳步前进，既发扬民主，又厉行勤俭经营，一年更比一年增产增收，赢得个体农户的信赖和支持，逐渐扩大为全村一社。“穷棒子社”的巩固、发展，标志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这里取得胜利。当时确实起到典型示范作用，受到毛泽东主席多次表彰。成似容易却艰辛。我永远忘不了当年办社经历的人事情景，回忆起来还都一一如在眼前。

靠三条驴腿办起农业社

1952年，我们遵化县第十区雨水调匀，岁丰足收。这个区的东小寨、王老庄两个早办的农业生产合作社，都闹了上等年景。比西铺村里办的互助组强多啦。

消息是贫农王林给传开的。他在街头那么一嚷嚷，立即招引来许多人。大家议论纷纷，对合作社说长道短。说长的认为，既

然人家能办，办得蛮够意思，咱们也要办，也一定能办成功，人多力量大嘛！道短的则认为，亲兄弟还闹分家呢，七姓八户归拢在一块儿，没那么容易。

听到乡亲们嗡嗡的舆论，我们村党支部的成员心情更不平静。

经过土地改革，西铺的劳苦农民破天荒成了土地的主人。旧社会，“穷人头上两把刀，租税重来债利高；眼前只有三条路：扛活讨饭坐监牢。”这种悲惨命运终归得到摆脱。但是，由于长期封建势力的统治压榨，加上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遗留的战争创伤，使得多数农户仍处于贫困状态。

生产资料严重不足。平分土地时，我们全村仅有23头驴、6头牛。土改后极少添置。贫下中农顶多有几分之一的“驴股”、

“牛股”，多数户“耕者无其畜”。每八户还均不上一套农具。耕畜、大农具集中在少数富裕户手里，他们非等人家本主使完才可能借用。同时，缺种、少肥、没劳力。旧社会扛活、讨饭熬过来的王生分得了7亩8分地，就计划着生产。当时他又喜又悲，高兴的是：土地到底还家了；难过的是：自己是瞎子，孩子幼小，光靠老婆一个女人家，动啥没啥，能把地种好吗？为难着窄，他老婆禁不住落泪。王生说：“哭什么，有了妈还怕生不了娃娃！毛主席既然把地分给我们，我们就是用手掘，也得把它种上；就是用眼泪浇，也要让苗长起来。”

话虽这么说，还得想办法。贫农屈福万实在借不到牲口，就靠人拉耢子播种。可是家里只有他和哥哥是劳力，屈福万年小力薄，拉不动，只好用镐刨坑下种。结果误了农时。至于象王生那样的农户，每年都有些地因为无力播种撂荒。遇上旱年，出苗的耕地也弄不到多少收成。

生活上主要困难是粮食。结束了扛活做月当牛马的苦日子，翻身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干活，恨不得使上全部力气，起早摸黑，从春忙到头，仍落个“收不收，吃一秋”。通常年景是“糠菜半年粮”。老长工梁进田，好不容易由亲戚家借来种子凑合种上

地，全家人却饿起肚子，无奈何，在分得土地的当年，又被迫出村打了3个月的短工。贫农戴老八的7口之家，土改分下土地17亩，草房3间，心高气盛地指望过好日子。春上好歹刚种完地，戴老八便累倒了。7口人一碗玉米糊喝三天，没钱又没粮，只得拿命抗，十来天的症候，死了，才49岁。女人守着5个孩子，愁楚不过，一病不起，戴老八去世不到百天，她也离开人间。儿子二满在乡亲们的帮助下，典房卖地，偿还欠债。把5亩半地当给白马峪的一户富农，草房当出一间半，总共当得2石5斗玉米。还完爹死拉的饥荒，葬埋了他妈，一颗粮食未剩，只剩五张小口，唧唧哇哇等食吃，哪能硬等着往死里饿呢？戴老八的哥哥生了法儿：让二满把几个妹妹送出寄养。二满从此到处流浪，讨饭度日。

小船抵挡不了大风浪。身单力薄家底穷的个体农民，怎能经得起天灾人祸？正象人们常说的“三月桃花一时红，风吹雨打一场空”，在自然灾害面前跌倒了就爬不起来。1949年发大水，西铺村边的沙河泛滥，90多亩耕地被冲毁，卷走房屋14间。好不容易经养的庄稼漂得无影无踪，望着大片大片的淤柴、砂砾，户主们抱头痛哭。贫农王荣分得的11亩地被冲去四五亩，越思谋越感到，全年的生计难以维持，只得让儿子离家做工伙。

与此同时，本村或外村的一些富裕中农，靠手里的车辆、牲畜，跑运输、卖套。有的开始雇工、买地。土改后不久，西铺就有11户贫农被迫出卖土地73亩，典去房屋50间，严重缺粮的74户，欠债的60多户，有4户重新讨饭。

在这种情势下，党和政府十分关怀西铺农民的疾苦。土改后的几年间，平均每年给这村发放5万斤左右救济粮，100多套寒衣，还有许多布匹和现款，帮助他们渡过难关。

雪中送炭，更激励西铺农民穷不移志，顽强抵制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吞。贫农王生在旧社会讨了24年饭，被折磨得双目失明，光靠获得的土地，依然不能安生立命。这时，有个叫张让的来家

串门，他受白马峪一户富裕中农之托，想出高价买王生的地。王生一听如同轰雷炸顶，他宁可重新拉棍乞讨，决不卖掉共产党、毛主席分给他的翻身地、打倒地主的站脚地。他愤慨地说：“这地是穷人的心，就是给我万两黄金也甭想买走！留得青山在，哪怕没柴烧？”当时西铺50多户贫苦群众，人同此心。

王生躺在炕上，心头如同烧了一把火一样烦躁。左思右想，从前活地狱的图景又在眼头晃悠。咱村出地卖房的可不少啊！这样下去还不得受二茬罪，吃二遍苦么？请示上级出出道儿吧！

其实，上级早指出了金光大道。1951年初，县委派人到西铺，已在党内传达贯彻了党中央《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（试行草案）》，同时，结合学习过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耿长锁合作社的办社经验。西铺村的翻身农户，在面临下一步该“向何处迈”的关键时刻，做出了自己的正确选择。

老贫农王生第一个自愿报名参加了互助组。

提起互助合作，西铺的“穷棒子”並不陌生。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早在土改之后便自发地开展互助互济。一到春播、秋收大忙季节，三两户“插伙”，互相“换工”，共同完成紧手的庄稼活。虽然户数有限，时有间断，但是“一壶水大家喝，一个镢头伙着吃”。取我之有，补你之无，支撑当年生产，彼此都借劲。

就这样，1951年春上，我们西铺响应党的号召，趁热打铁，很快地建立起11个生产互助组，其中一部分是常年互助组。到1952年初初，临时互助组全部转为常年互助组。原有的11个组调整为8个组，又吸收一些单干户进来，扩充了规模。全村加入互助组的农户达到全村总户数的80%。

回顾这段经历，我们几个支部成员确实坐不住了。支委杜奎找我合计，他说：“依我看，大家议论的办社是条正道儿，土改才三四年工夫，咱村不少人典房的典房，卖地的卖地，挡都挡不住。新发户拉脚、卖套，置地修宅，胃口越来越大。你没听白马峪几家富裕户吹出风来，再过几年，把四十里铺（西铺原名）

那些穷小子的炕头也给买过来！该有多气人！看来只有把大伙的土地都全并到一块儿，集体劳动，互助互济，才有希望达到共同富裕。”

我说：“农业社肯定比互助组强。”我这话也有根据，因为区委就曾明确传达过党中央、毛主席的指示，指出：当前的互助合作运动有三种形式，一种是临时互助组，一种是常年互助组，还有一种就是合作社。这好比上楼梯一样，步步登高，一级比一级棒。我们区东小寨和王老庄试办的农业社，就完全可以证明。具体到我们西铺，到底能不能一下子办得起来呢？我们想来想去，回答是肯定的。

事情明摆着呢，我们村互助组，在扶贫济困，搞好当年农业生产上，是起了积极作用的。可它毕竟没能脱开个体经营的老辙。有的组，闲时候伙着做，忙时倒单干，还是顾全不过来。有的互助组虽说是常年的，也存在人在组里，牲畜、车辆、大农具留在组外继续拉脚、卖套的情况，搞得好的，也问题不少，“齐工找米”，找来找去，还是有驴工、牛工的户占便宜。穷苦人照样免不了再去给人家当“工伙”使唤。眼下时机已到，群众又有这样的要求，农业社必定一办一妥，关键是事在人为。

我跟杜奎迈出家门，一同去找党支部书记关凤孝，研究决定召开个党员会。会上，我们把想法一摊，在场的都举手赞成，踊跃报名。加上会后要求参加的群众，总共二十七户。等写了申请书，就责成我和杜奎去区里联系。

区委考虑农业社尚处试办阶段，经验还需摸索，开始不大同意。后来，看我们决心大，真有九牛拉车的劲头，终于批准了。

我高高兴兴拿了批准书回到村里。当晚与全体党员见面，可一上来却冷了场。闷迟了约摸半顿饭工夫，还不见有人吱声。经启发一阵子，温化之才开了口：“一个共产党员嘛，任何工作都应该带头，搞合作社更应该做群众的表率。不过要讲全家愿意呀，我还办不到，主要是我那老婆，我费了半天唇舌，她也不开

窍，只好等等再说，实在没法子。”

显然，他当众打了退堂鼓。我当时挺惊讶，可没马上表态。还是杜奎沉不住气了：“你不是说只要你同意，家里没问题吗？怎么一叫真又变卦啦？一个共产党员干工作还得朝老婆子讨‘圣旨’，这象啥话？她脑袋不开窍，你还甘当尾巴？”

温化之分辩说：“她死活不应扣儿，我不能总跟她生气呀，再说，这入社也不见得非一个日子掐齐，等一年咋就不中呢？”

他俩这一顶嘴不要紧，讨论问题可就僵持住了。接着发言的，要么吞吞吐吐，要么模棱两可，情绪受到感染，会不好再往下进行，为了慎重起见，暂宣布散会。

屋里只剩下我和杜奎。我拿出从区委领来的那张办社批准书。“啪”地一下放到炕上：“大家都不一心一意入社，看来只好把这个原件送回啦。”

杜奎急转过身来，“怎么？送回去？不行！上级批准啦，谁爱入不入，都不入由咱俩挺着也得办。”

我知道杜奎有爱急躁发火的老毛病，故意追了他一句：“那好，我当主任，你当社员，干不干？”接着，劝导他：“不论遇到啥事情，越赶在节骨眼儿上越要冷静点。”

其实，区委批准我们办社时，赵书记就给开了专治急躁症的药方：党中央、毛主席一再指示，合作化道路是几千年来未走过的道路，不仅存在严重的阶级斗争，同样存在两种思想的斗争，群众中总会有先进和落后，必须通过艰苦细致的疏导工作，唤起大家的觉悟。一家要积极领导，稳步前进。西铺是个社情比较复杂的村子，办社一定要注意依靠贫雇农，从无到有，从小到大，坚持到底就是胜利。

我们仔细查点了一下这次报名入社的都有哪些户。原来有王林、王荣、王生哥俩，邵庆林、邵庆冒弟兄，还有……看得出，不是讨过饭的，就是扛活作月的这些农村无产者。

正当这空儿，党员梁近田和吴秀英脚前后脚进了屋。我们问：

“散会你们不是走了吗？咋又卷回来啦？”梁近田说：“我考虑好了，我是党员要坚决听党的话，入社！”吴秀英说：“我也考虑好了，我是党员，丈夫又在朝鲜前线打美国鬼子，党咋指示咱咋办，入社！”

于是，我们4个人就按照上级党的指示分头深入下去做工作。在街东头碰上了王生，他撂下手里的扫帚，闻着语声凑近前，开口就打听：“这社多时成立呀，我可是棒打不回呀！”我们告诉他：别急，快给你喜信啦。王生连说：“那好，那好！”单身汉、复员军人佟瑞芝，把我们迎进草房屋，问东问西。一问他到底想不想入社，他把脸拉长了：“什么？谁说我不想入社，我找他算帐去。”要过18年饭的邵庆昌，差点卖掉翻身地的杜相仍都是一心主定入社的铁杆派。等登门动员中农杜忠的时候，可就碰了钉子，一经念叨已有的十几户都是谁家，他竟撇了嘴：“入那干啥？我没劫可遭了？快别在我身上操这份心啦！”至于家中牲口车辆齐全的温永和，见了我们让烟倒水挺热乎，一提农业社，可就摇头了：

“不！不！你们先办吧，我还不够格，往后再看吧！”

这样走走串串，我们果然看清了办农业社究竟对哪些人最有吸引力。有车辆牲口的中农户眼下还心存疑虑，怕吃亏、上当，我们决不强拉硬拽。贫农户入社也完全自愿。说合作社好，西铺没亲自办过，大家不摸底，应该允许人们三思而后行。等眼见本村农业社扎住根，枝繁叶茂了，自然全都奔到这条道儿上来。

由于我们4名共产党员，拿出打日本鬼子、闹上改那么一股子拼闯劲儿，死气白赖地抓工作，几天工夫，总计串连了20来户入社的。接触人多了，言来语去，终于弄明白，开头那场小风波一方面固然由于某些人犹豫动摇，另一方面也不排除王悦那号人暗中“扳倒闸”。他拉拢少数富裕中农，仗着自己腰力粗，今儿个掺和到这边，要跟你搞互助；明儿个换靠到那边又要跟他合伙互助。老贫农王荣一度成了他们紧拉的对象，企图打开突破口使我们办社计划落空。

杜奎了解到这种动向，找我商量要去找王荣，要把他稳住，千万别上当。我同意了。杜奎当面一盯问他“主意到底拿定没有？”王荣哼了一声没言语。再追问，他才搔着脑瓜皮拘拘吃吃地说：“这，这入社么，我打算……明年再说。”

杜奎並不退让：“你不入社，还想入互助组不？”

“互助组么，好了就入。”

“农业社要比互助组好呢？”

“那就——就可以入社。”

杜奎接过王荣的话头：“大哥，入社的好处你也听清了，你想想共产党哪项政策给过你空桥走，为啥对入社总拉心拉肝的？”

王荣看着杜奎的脸色，觉得态度挺硬，低头打了半天阴沉才开了口：“农业社的好处我都听了，可我今年不入。”

杜奎稍一考虑，便提高嗓门：“告诉你说吧，农业社比互助组有优先权。”

王荣对许多入社宣传都没入耳，但对这“优先权”却非常留意。杜奎还特别解释，组织起来之前，西铺差不多每逢冬春都接受政府救济。成立互助组，生产提高了，才逐渐减少。前几次发救济粮，王荣都是重点。当然入社的优先权主要是在生产方面，比如供销社来了大骡子大马，或是胶皮大车，准得先供应农业社，因为它是集体所有，互助组是个人所有，就是给，谁家买得起？

王荣到底是个精明的庄稼人，明白多得点救济粮，对自家有利，更明白棒牲口好车辆在农业生产上有大用场，这“优先权”的吸引力促使王荣“霍”地醒过懵儿来，决定还是入社。

通过汇报各户入社情况，拢了拢20来户。第二天晚上，召开农业社成立大会，地点特意安排在王荣家里。有人对这样安排不够理解，认为他思想有问题，为啥偏在他眼皮子底下聚群呢，那该多别扭。我并不是这样想，若到别处开，他很可能不参加，若到他家开，他一家子人等于可参加会了，让他们看到大伙入社的热腾

劲儿，比光讲办合作化的大道理强。有的富裕中农总想拉拢他，他正骑在墙头上左右打晃，要靠大伙的行动把他拽过来。

挨门挨户通知个遍。工夫不大，王家的东屋就挤满了男男女女。老头们坐在炕沿上，炕头自然坐一片老婆儿和媳妇，其余大都蹲在地上。炕西头放个饭桌，桌上点盏小煤油灯，端起灯照着数了数，43人，21户，差不离到齐了。

借着灯光，我转了一大圈把大伙端详过之后，又往炕头上扫了一眼，正好跟王荣老伴打个照面。她绷着的脸立刻调了过去。我故意放开嗓门儿招呼：“大婶子，大婶子，头次到你家开大会，快给大伙烧点水喝吧！”

王荣老伴皱了皱鼻子，堵气嚷嚷地说：“天挺黑，灯不亮，黑糊糊的没法烧！”

我忙告诉她：“你也不用着忙，等把社办好，我给你安上电灯。”

“电灯？我没那份命！”

我又说：“命，随思想走，思想好了命就好哇。”逗得满屋大笑。

大伙一笑，我想到王荣。他怎么不见踪影？用灯里外一找，发现了，王荣正在堂屋地上摸黑蹲着呢。

我们一请他这房东进屋坐，王荣立时没好气：“你们不知道我屋子窄，还偏上这儿开会，真是……我在这儿挺好！”

杜奎乐着说：“哎，人哥不用着急，等社办好了，保准叫你盖新房。”

“新房？我没那份福！”

杜奎也学着刚才我的说法：“福，也随着思想走，思想好了福就大呀。”大伙又笑了一阵子。这时，我就宣布正式开会。

首先由我把办农业社的宗旨说道说道，讲到最后着重强调：“根据上级指示精神，办农业社必须坚持自愿的原则，不但入社自愿，就是看社不好，秋后还可以退出，决不强迫。只要我们把社

的生产搞好，社员收入肯定会逐年增加，必将吸引更多的农民走这条路。”最后，我还有针对性地补充两句：“到现在，有的人还二心不定，对办合作社到底优越不优越还摸不清，刚才不是说了吗？你如若看社不好，秋后还允许退出。”

一直蹲在外堂屋的王荣，耳朵发背，屋里讲啥听不进多少，只是我来了补充的两句，竟听进去了。入社自愿，出社自由，这还行，相信党支部说的会算数。他站起来朝前挪了挪，用肩头碰碰旁边的老头，小声叽咕起来。王林老汉见这动作，不由得插嘴说：“别说秋后，就是下去三年五年我也不入社。大半辈子扛活熬过来啦，办社还能办出第二个穷来？”

王林老汉这么一讲，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，会场立刻议论热烈了。王荣听出王林的话中带刺，就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有不明白的地方问问还不中吗？”大家则东说这个，西说那个，总体的意向越来越明朗——决心办社。举手表决，一致同意。我们西铺的农业社正式成立。

我掏出笔记本，叫大家自报土地和牲口农具。这下，又没人吱声了。人群里冒出言语：“这二十多家的家底不都在你俩心里装着吗？往本上一写就行了。”

王荣主张还得叫各户报报，大伙心里也好有个底儿。

开报啦，报一份，记一份，一边记，一边算。报完了，当场宣布：土地总数230亩。因为各户没有大农具，开始登记牲口，又是没人吱声。难怪冷场，哪一户有整牲口呢？

我忙说：“大伙可能认为自个的牲口少，没法报，这不碍事，有多少报多少，凑在一起，不就多了么。”

杜春的毛驴是4家伙养的。范玉林使的毛驴股儿多，是8家的。杜亮那头瘦驴是5家共有的。温自礼比别人驴股多，竟说不上该均得几分之几，反正他使唤的驴，12天轮一班儿。拿玉米粒照老法儿计算，若按驴腿说，三条多一星点。掐零就整，就算三条驴腿。比起原来的某些互助组还差不少呢。王荣参加的那个中

农组曾有两头牛两头驴。

杜奎对王荣说：“大哥，你在那中农组占了啥便宜？还不是用人工换点畜力用。咱驴腿虽少，可人多呀，众心一条心，黄土变成金。生产一定搞出个势派来。”

就这样，一头毛驴，社里用3天，社外用1天，过上个把月再给社外贴一天。

一个社要有领导。这顺利，大伙认为我和杜奎两人最合适。结果，我当选为主任，杜奎担任副主任。参照东小寨的章程，还要推选一名会计，要求大伙痛快地选。到底还是不痛快。庄稼人只知道有“先生”，“会计”这名词没听说过。

“会计”也好，“先生”也好，反正是管钱财账目的，没文化干不了。会计的职务弄明白了。21户里究竟谁有文化呢？穷苦人从小知事时起，天天忙着卖命糊口，哪有幸运上学呢。手指头扳来数去，就是想不出合适的人来。

看大家挺为难，我便提议：“看佟启怎么样？”人们觉得奇怪，佟启还没入社，咋当社里会计呀？其实我和杜奎早就考虑过这个问题，也做过发动，他同意入社。今晚，因家有病人顾不上参加会。征得大伙同意，我们把佟启找来了。

佟启只上过两冬半学，有股子钻挤劲儿，在我们那群人中间也算得上秀才啦，要说矧子里拔将军，拔来拔去也只有他。佟启一看推辞不过，就搬出实际困难，就是光看他识几个字不中，只会写苏州码，没法横记会计账。我们没松口，三条驴腿能种地，老苏州码同样可以记账，横写也罢，竖写也罢，反正好记性不如拙笔头。再说本事全凭学凭练，功到自然成。这么左鼓励右开导，佟启终于勉强任了职。

合作社成立第二天，我们就敲开锣鼓齐上阵。我们社干部带头拉队伍奔了猫儿港南山，搬石头，挡坝阶，修梯田。

大冷天，阴坡露了冰碴，干活人热得冒汗。我正敞开短袄刨地，猛抬头，见远处移动过来一个小黑点。那黑点越来越大，到

了近处，原来是村里的孤儿戴二满。脸黄瘦黄瘦的，身上只穿件破襟断袖的单衣，蓬散着头，光着脚。我一看见他，立时想起他家的凄惨遭遇。土改那年，他们戴家分了20多亩地，过上了翻身日子。谁成想，第二年夏天，他爹妈先后染病去世，留下他和4个妹妹。那时候，各家单干着，穷叔伯们都没力量照管一群孤儿。二满含着泪卖掉房子和土地，还清欠债，埋葬了双亲，又含着泪送大妹妹当了童媳媳；把3个小妹妹全送了人。我们党支部几名支委虽然帮了不少忙，还是顾全不了他的常年生活。后来他流浪到县城，给一家饭铺当小堂倌。可是他太瘦小，挑不动水，还常打碎盆碗，东家硬是把他辞退，生路断了，又流浪回村。他哪里会知道，眼前火爆劳动的乡亲们如今已成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正式社员了。

当天中午，我把二满领到我家吃了饭，还给他找来一件破棉衣，找来的那双鞋不太合脚，又亲手给钉上鞋带。

二满要地没地，要力气没力气，年岁还小，个头虽不如三条驴腿的灰毛驴高，总归是个苦孩子。水流千里归大海，他返奔家乡要求入社。组织起来就为大家富裕，办起社，更有条件顾全他了。经过民主讨论，二满被批准为我们社的一个后续户。我摸着二满的脑袋说：“得啦，这回你在咱庄算是不走啦，我看哪，给你起个大名，叫戴存吧！‘存’，就是咱的农业社把你收留住了。”

小戴存加入“穷棒子社”，从此孤儿不孤。其余22户社员把他看成亲人，都非常疼他。无论转悠到哪儿，只要赶上吃饭的时候，总是东家叫，西家拽，社干部家炕桌上时常为戴存多添个粥碗。宁可自家人勒紧裤腰带，也得让小戴存吃饱。戴存见到党员、干部瘦削的脸儿，打心里难过，暗攒一把劲，当个好社员。社里出工他不拉趟，22户社员把动大力气的活计揽过去，不让他干。我们社众手拉帮一个孤儿，在遵化县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传为佳话。